

文物与 中国古代 市场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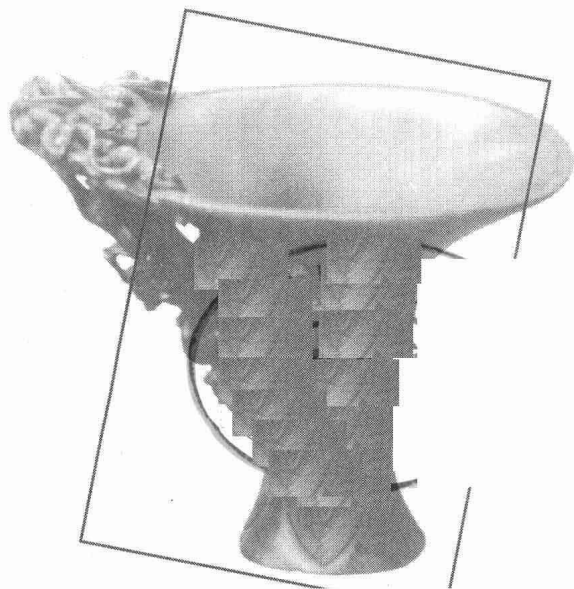
管慧娟 郑家茂 郑启航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物

与中国古代 市场经济

管慧娟 郑家茂 郑启航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与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管慧娟,郑家茂,郑启航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622-2867-1/F·145

I. 文… II. ①管… ②郑… ③郑… III. ①文物—考古—中
国 ②市场经济—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70.4 ②F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8831 号

文物与中国古代市场经济

◎管慧娟 郑家茂 郑启航 著

责任编辑:周柏青

责任校对:章光琼

封面设计:郑 铨

编辑室:编辑五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督印:姜勇华

字数:262 千字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875 插页:4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8.00 元



〔商〕四羊铜甗（第26页）



〔秦〕长匣式青铜灯（第73页）



〔战国〕菱纹铜盒（第28页）



〔元〕梵咒文铜镜（第85页）



〔五代〕十二生肖纹铜鼓（第76页）



〔明〕镂雕螭纹犀牛角杯（第1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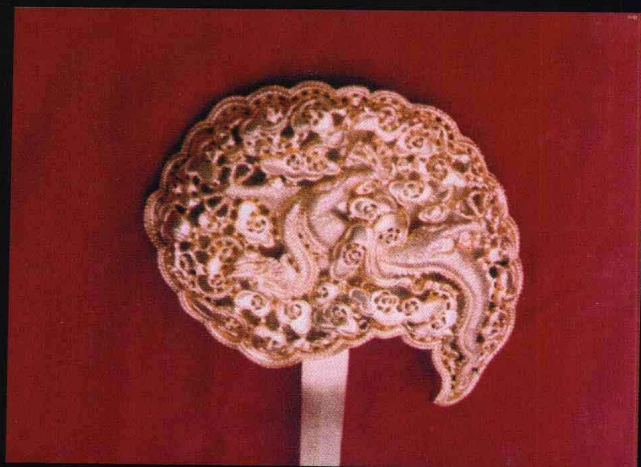
〔明〕御赐张居正砚（第126页）



〔明〕螭纹三耳白玉杯（第93页）



〔汉〕御史大夫安陵亭侯朗玉刀（第90页）



〔明〕衡山王墓龙纹金簪（第121页）



〔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鸾凤纹玳瑁碗（第1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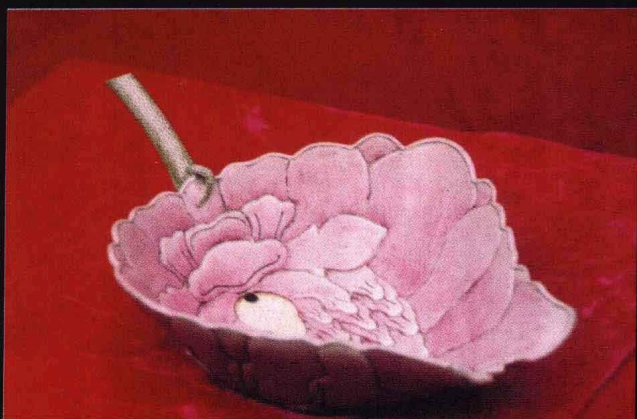
〔清〕宜均釉开片荷叶形三足洗（第175页）



〔清〕德化白瓷铺首鸡腿瓶（第165页）



〔清〕德化白瓷贴花动物纹犀角杯（第170页）



〔清〕粉彩荷花匣（第178页）



〔明〕衡山王墓鎏金银碟（第1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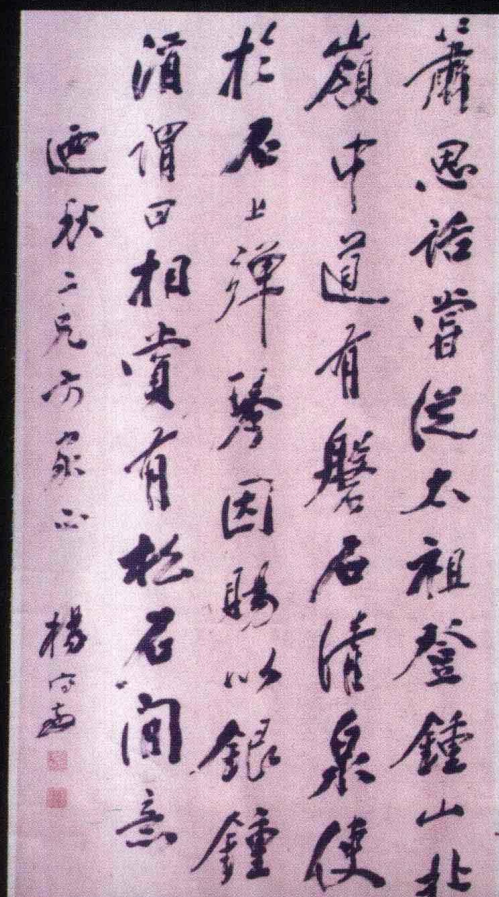
〔清〕边寿民《芦雁图》（第194页）



〔清〕董旭《钟馗降蛛图》（第190页）



〔民国〕绿釉贴花云蝠双龙纺方印盒（第183页）



〔清〕杨守敬《行书轴》（第212页）

前 言

“文物与中国古代市场经济”这一命题，以及以这一命题为一本书的书名，无论是在传统考古学，还是在新考古学中，都不多见，在经济形态史的研究中也是一个尝试。在这篇前言中，我们拟对本书作一简要阐释，以磋学于同行同道，将这一有意义的探索推向深入。

把文物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并非我们的创造和异想，而是因为历史的悠悠岁月中，文物本身就与人类的经济生活，特别是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人们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尽管文物及其交易与其他商品及其交易相比，存在着共性，有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并在交易中遵循通常的市场法则，但是，文物及其交易与其他商品及其交易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文物有独特的时间要素、独特的量的供求关系、独特的质的认同标准、复杂多元的购买动机。文物交易的这些特点，使通常的市场法则发生了变化，变得奇妙无比，变得充满了刺激和挑战，其魅力足以使这一市场的主体为之激动，为之迷恋，由此激发人们对市场奥秘更多的遐想，对市场活动更多的创造。

人们乐于收藏文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物具有流通价值。所谓“藏家无三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其市场价值的膨胀属性作为内驱力的。在古代和近代，人们为实用、鉴赏、象征、研究、增值等目的而购买、收藏、保存和保护文物，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促进了文物生产和流通的繁荣和发展，给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为市场经济的发生、发育、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现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刚刚复苏，文物收藏的世界性热潮就到来了。即使

在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才 20 余年的中国，文物市场也得到了令人惊叹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专门为收藏而进行的生产迅猛增长，古旧物品迅速增值，纯粹为投资、赢利而进行的文物交易持续火爆，与此相伴随的是文物盗窃、文物非法挖掘和文物走私的猖獗，造成了文物交易市场的严重扭曲。这些都说明文物这种人类宝贵的不可替代的社会遗产，承载着市场经济的种种信息，浸透着市场经济的种种特质，并以自己特有的存在形式——实物，述说着与市场经济的种种联系。读懂这些语言、破译这些信息，以获取有益的启示，正是我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经历了数年的探索之后产生的强烈愿望。我们期望通过“文物与中国古代市场经济”这一独特视角，去开拓考古学和文物研究的新视野，寻找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经济社会中，被严重局限了的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为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这个世界，是一幅由无数的事物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错综复杂而又千变万化的图景。在这个图景里，没有哪一种事物、哪一种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是不依赖于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得以发展的。这一结论不仅是哲学的，而且是实证的、科学的。恩格斯说：“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九世纪），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极其辉煌的成果，甚至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十八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部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32 页）。他还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交叉、结合，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很显然，人类早在19世纪，无论是对自然的认识，还是对历史的认识，都不再需要从头脑中去想出联系，因为实证科学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人们能够自觉地掌握整体思维和相互联系，这一进程还会大大加快。20世纪这一进程加快的显著成果，莫过于信息论和系统论的问世。信息论和系统论证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理论，使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20世纪科学园地里的奇葩。正如德国著名科学家普朗克所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纯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转引自《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第1期吴良镛院士文）。因此，研究者只有摒弃孤立的、片面的研究方法，借助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再现古代社会的真实图景，解开人类行为的种种谜团，在一定范围内让科学界摆脱困惑和困境。

事实上，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考古和文物研究中，引进新学科、新技术、新方法、新角度、新领域的趋势已经是世界性的，只不过在各国的表现和应用的范围有所不同罢了。这种趋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颇有影响的英国考古学者戈登·柴尔德在《人创造了他自己》一书中，提出了农业发明和家畜饲养不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食物生产的革命”，而且是人类用火以来的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观点。到了50年代，柴尔德又提出了“城市革命”的概念。这意味着考古学者已开始超出对具体器物的研究范围而涉足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也在这个时候，美国年轻的考古学者瓦特·泰勒在其博士论文《考古学研究》中，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考古学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考古学家的目的决不只是进行准确的田野发掘和发表发掘报告，也决不只是进行准确的地层比较和器物类型划分。他批评当时美国的考古学过于重视对人工制品的分析，而忽视对人工制品折射出的非物质方面内容的研究，忽视考

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体化。他认为，考古学是一门行为科学，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人工制品所反映的人的关系和行为上。泰勒的观点在 50 年代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始于 60 年代的一场新考古学运动，出现了一个新考古学派。不少考古学者在考古学和文物研究中，纷纷引进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研究方法和手段，并突破学科壁垒，进行交叉研究，致使考古学出现了很多分支，如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经济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美术考古学等。

考古学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考古学者和考古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几十年来，我国也有不少考古学者逐渐接受各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新技术手段，通过对不同领域的交叉研究，把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拓展到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个领域，如农业考古、生态考古、民族考古、宗教考古、音乐考古、美术考古等，这从已发表的考古学著作和大量的考古学论文中得到了证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引进对方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发现文物与市场经济形态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共生共长的社会生活土壤和相互依存的动态联系。一方面，文物既有作为古代市场基本特征的商品属性，又依托于市场经济形态，在交易中得以丰富，并在交易中展示其作为文物所特有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形态恰恰又因为文物及其交易而充满活力、刺激和挑战，并在历史的推移中积累、传承文化和文明。文物与市场经济这种惊人的动态联系，让我们激动不已。尽管我们明知自己揭示这一动态联系是多么地力不从心，尽管我们明白，我国学术界历来对文物的研究和对市场经济的研究都是严格地守着自己的领地，二者没有多少联系。这种“学科化”知识的自我封闭，使二者之间的“接合部”至今还是很少有人涉足的“蛮荒之地”。我们愿以十二分的热忱，成为这一“蛮荒之地”的垦荒者，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生活的最初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形态是自自然然伴随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纯属天然，纯粹表现为

一种伟大的自然力。而以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商品经济，却是人类自己的伟大创造，表现为人的伟大社会力。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任何社会经济运行形态的发生，都依赖和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形态在古代社会的发生也不例外，当极其低下的生产力能给人们带来剩余产品的时候，就具备了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发生的可能性。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农业和畜牧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才使商品经济的发生由可能变为现实。不过，准确地说，这种发生着的新的经济形态，还不是真正意上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少量剩余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交换，纯粹出于偶然，出于人的某种需要。至于因生产力提高而多生产出来的农牧产品即剩余产品，在当时，其直接目的或曰直接动机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贮存，以备食物短缺时食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交换完全不具有商品和商品经济的属性。相反，被后人视为文物的人工制品，如陶器、玉石器、漆器、织物及各种装饰品，因其实用性、观赏性、文化性（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文化）及其生产技术的专门性，被人们有意识地多生产出来，其直接目的或曰直接动机则是为了交换，即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虽然当时这些人工制品的生产，还没有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部门，但生产动机的交换性，已使生产和生产物具有新的经济形态的气息。换句话说，文物的商品气息先于、浓于其他物品，文物交易也最早染上了商品经济的色彩。

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古代市场经济进入了形成期。这一形成期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手工业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且专门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独立的社会经济部门；二是商人和商业的出现。前者使商品生产有了自己的物质载体和人格化代表，后者使商品交换有了自己的物质载体和人格化代表。二者的统一，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进步，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历史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并在矛盾中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古工

作者发现了这一时期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门类不同的手工业作坊，而被后人视为文物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漆器等，就是在这些专门作坊里生产出来的，其中大部分通过市场进入消费领域。交换的发展催生了商人和商业。在殷商时期，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就已出现，《尚书·酒诰》中说，殷人“肇牵车牛，运服贾”。不过，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与百工一样大多隶属于奴隶主贵族，称为“工商食官”，主要为奴隶主贵族服务。春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产品流入市场增多，旧的“工商食官”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民间独立的商人应运而生。春秋晚期，富商日多，有的大商人还周游列国做生意，甚至倚仗雄厚的财力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人们购置人工制品的动机也日趋多样化，除为家用外，还为祭祀、象征身份和财富、鉴赏、收藏、研究等而购置，从而大大推动了文物的生产和流通，甚至在西周时，还出现了仿制文物的赝品生产和赝品交换。可见，在市场经济的形成期，文物已经是市场的重要角色，文物生产和文物交易在市场经济的整个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

铁器时代是古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期。在古代中国，由于自然经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由于封建国家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也由于商品经济形态与自然经济形态固有的矛盾和冲突，致使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只能曲折地发展。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悠悠岁月中，无论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还是商品经济的沉寂衰退，被视为文物的人工制品的生产和交易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时期，人类的收藏活动达到高峰。在古代对外贸易中，贸易品除一部分农牧产品外，最多的还是被后来视为文物的人工制品，如瓷器、漆器、玉石器和精美绝伦的丝织品等。外国人大量购置这些东西，除实用外，更多的是作为珍奇异宝收藏。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市场经济中，没有文物和文物交易是难以想像的，更不用说会产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诗人刘禹锡在诗中描写的“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的繁忙海上贸易。文物及其交易以其特有的魅力给古代市场经济增添了活力和生